

# 悖道后的恩典

## ——多纳派事件给当代中国教会的警示与启迪

吕居

### 一) 今日中国教会的潜在危机

在现今的中国，文革似有回潮之势，社会和制度环境日趋肃杀，教会的生存处境日益恶化。在严寒高压的气氛中，无论是三自还是家庭教会，都面临严峻挑战。政治高压让一部分基督徒胆怯退让、屈从妥协，甚至签字否认信仰；而另一部分基督徒则傲然挺立、威武不屈，甘愿背起十字架，忍受牺牲，如风雪中的腊梅，越冷越溢出高洁清香。政治压力促使教会分化，产生不同的派系，随后又在不同的派系中挑起争端，让教会内部彼此争斗，这些世俗政权惯用的斗争手法，在过去几十年中对中国教会造成巨大的伤害。不仅如此，政治高压还会催化人性里面的恐惧软弱或倔强自傲，让跌倒的和站稳的产生嫌隙，彼此为仇，从而不断撕裂教会、破坏合一。

上述令人痛心疾首的现象，正在目前的中国教会内再次上演。2018年下半年，笔者有机会与各地同工团契交流，发现各地的教会都普遍面临各种形式的逼迫，以下是对这些逼迫的简要描述，相信置身水火的国内基督徒读者，对这些逼迫有着切肤之痛：

- 在体制内的党员需要明确表态，是要退党还是否认信仰，两者必选其一。有些信仰坚定的基督徒明确表态宁愿退党也不愿否认主，但他们被告知，不允许选择退党，只能选择退出基督信仰。
- 如果坚持基督信仰，就必须辞去公职，继之而来的是许多不公平的惩罚性规定，所有工资福利及相关待遇都被剥夺殆尽，净身出户，成为社会待业人员。
- 有些信徒软弱，签了不再信主的保证书；有些人在填表签字的那天故意请假，让同事帮着填写，避免自己直接悖道否认主；
- 有些用单位人事关系来压信徒；因为有不愿意退教的信徒，整个单位就得不到精神文明奖，所有的员工都会失去可观的奖金，因而嫉恨坚守信仰的基督徒，对这些信徒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有些信徒因此辞去工作，或违心签字，放弃信仰；
- 学生和公务员是重灾区；军队系统更是如此，只要填写有信仰，就必定会被清退；
- 以前清洗的对象是党员，现在也波及到共青团员
- 许多在校基督徒学生，被校党委、团委的政工干部不断骚扰，威逼利诱，被要求不再参加聚会，与教会切割清楚，签字表态，不再信主；
- 有些大学生基督徒不愿放弃基督信仰，政工干部就打电话通知老家的父母家人，告知学生家长，该学生入校入了邪教，让家人帮助劝说；父母心急火燎赶到学校，跪在儿女面前，声泪俱下，要求儿女退出信仰；那些能顶住学校压力的学生，大都无法面对这种亲情绑架，只得违心签字，否认信仰；
- 逼迫学生放弃信仰的风潮，在某些地区波及初中、高中，甚至小学、幼儿园。

目前正在发生的新一轮逼迫，手段各异，但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信徒填表签字，否认信仰。这一场的逼迫，又将在教会身上，留下无数疤痕。这场逼迫的结果，会产生一群圣徒式的人物，他们为了信仰，甘愿放弃公职、福利、名誉、地位，成为美好的见证，象云彩一样围绕着未来的中国教会。但同时也会产生另一个群体，就是那些迫不得已，出于现实考虑，违心签字否认信仰的悖道的信徒；这些信徒遭受良心的谴责、圣灵的责备，在教会里抬不起头，有签字的表格作为悖道的把柄，握在别人手中。那些坚守信仰的信徒，完全有理由轻视这些软弱悖道的信徒，认为他们贪爱世界、卖主卖友、不愿背十字架，甚至不愿意与他们同在一个教会聚会，更不愿与他们同领圣餐。这些有过软弱悖道经历的信徒，倘若将来被主呼召，成为教会工人，他们所祝祷的圣餐、施行的洗礼，属灵效用是否会大打折扣呢？

今日中国教会所面临的危机，几乎是初代教会多纳派纷争(Donatists Schism)的历史翻版。初代教会对多纳派危机的处理，并不成功。但多纳派事件作为一个历史先例，可以为今日的教会提供参考借鉴。本文旨在通过对多纳派事件的梳理，分析类似危机的成因，描述其发展轨迹和历史后果，探讨初代教会应对策略的得失成败，并试图寻找避免类似悲剧在中国教会重演的可能途径。同一时期的北非希坡主教奥古斯丁参与了对多纳派事件的处理，为今日教会留下了许多历史文献和神学洞见。本文也将浅析相关的奥古斯丁文献，从历史神学和圣经神学的角度，总结多纳派危机对今日中国教会的警示与启迪。

## 二) 初代教会的叛教者(Traditors)和多纳派(Donatists)

初代教会在罗马帝国的遭遇，与现今中国教会的处境极为类似。从主后 64 年尼禄皇帝纵火焚城、嫁祸基督徒开始，直到主后 313 年君士坦丁颁布米兰赦令，罗马帝国数度逼迫基督徒。早期的逼迫大都出自掌权者的个人好恶或利益需要，也有一些源自各地民众偶发的情绪宣泄。由于罗马帝国版图广大，基督徒受到逼迫后可以逃亡或移民到其他地区，仍然可以找到相对和平的生存空间。然而，教会的生存处境从主后 250 年开始恶化，罗马皇帝德西乌斯(Decius)于是年一月颁布诏谕，勒令所有罗马臣民必须在限定时限内，在各地行政长官的监督下，向当地的传统神祇献祭，并与当地民众一起吃喝祭祀用的酒食<sup>1</sup>。任何违抗该法令的臣民将被施以酷刑或直接处决。这一谕令使罗马境内的基督徒群体产生分化，一些信仰坚定的基督徒拒绝遵行这一带有偶像崇拜色彩的法令，因而遭受迫害，甚至被杀害。时任教皇的法比昂(Fabian)就因为不愿妥协而殉道<sup>2</sup>。德西乌斯的祭祀法令在北非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地区煽起当地民众的反基督教情绪，那些地区的逼迫一度极为严峻，让那些幸免于难的基督徒心有余悸，为后来多纳派在这些地区的兴起埋下伏笔。

主后 303-305 年，罗马皇帝塞米田(Diocletian)对境内基督徒展开新一轮迫害。北非行政长官采用宽严相济的逼迫手段，只要求基督徒交出圣经，作为否定信仰之象征性举动，就可以对这些信徒网开一面、宽大处理；而对那些信仰坚定、宁死不从的信徒，则严厉镇压。罗马政府的软化和高压措施，让北非的基督徒群体严重分化。那些坚定刚强的信徒遭

<sup>1</sup> David S. Potter, *The Roman Empire at Bay AD 180-395* (Routledge, 2004) p.241

<sup>2</sup> Chris Scarre, *Chronicle of the Roman Emperors: the reign-by-reign record of the rulers of Imperial Rome* (Thames & Hudson, 1995) p.170

受重创，在政教关系问题上被推向极端或激进立场。而那些软弱妥协的信徒则交出圣经、否认基督，在政教关系上放弃原则、迁就政府，完全丧失了先知式的胆量与勇气。这些失节的基督徒被称为“叛教者/Traditors”。Traditor的拉丁语原型为 *transditio*，这是一个复合词，由 *trans* (给对方) 和 *dare* (双手奉上) 两部分组成，合起来的意思是“双手奉上，交给对方”，引申为叛教、悖道。特指那些在罗马帝国迫害基督教时期，为免遭逼迫、交出圣经作为悖道标志的这样一批失节基督徒；也有的悖道者向政府供出基督徒名单，以求自保<sup>3</sup>。现代英语中的 *Traitor* (叛徒、背信弃义者) 和 *Treason* (叛国) 这两个单词就直接来源于 *transditio* 这个拉丁字根。塞米田逼迫时期悖道叛教的信徒不在少数，根据史学家沙夫的记载：“和此前的历次逼迫类似，那些贪爱世俗胜于天国的人数非常多，此外再加上叛教者/traditores 这个新的阶层，他们奉上圣经，交给异教政府，任由焚烧”<sup>4</sup>。这些悖道者大部分都是普通信徒，但也有教会圣职人员，甚至包括部分主教。

塞米田时期的逼迫如同黎明前的黑暗，持续时间并不长久。数年之后，君士坦丁即位，教会生存环境大为改观。主后 312 年米尔维安桥战役 (Battle of the Milvian Bridge) 之后，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一年之后颁布米兰赦令，在罗马全境承认基督信仰的合法性。持续两个半世纪的逼迫终于落下帷幕，由此带来政教关系戏剧性的范式转换。政府不再是基督信仰的逼迫者，而是倡导者和守护者。基督信仰不再需要信徒为之牺牲付出，而成了晋升仕途的垫脚石和敲门砖。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下，帝国强权原先加给教会的创伤浮现出来，分裂的伤口久久不能愈合，反而继续撕裂，酿成影响深远的多纳派危机。

多纳派 (Donatist) 是与叛教者 (Traditors) 相对立的一个群体，多纳派由那些在逼迫时期拒绝妥协的坚定的基督徒所组成，他们宁愿付出代价、甚至牺牲生命，也不愿卖主卖友。多纳派所推崇的标志性人物是撒拉戈撒的圣文森 (Saint Vincent of Saragossa)。在塞米田逼迫时期，圣文森由于不愿妥协而被捕入狱，罗马官员向圣文森承诺，只要他做出象征性的举动，把圣经投入火中，就可获得释放、保住性命，但遭到圣文森坚决拒绝。尽管罗马官员百般威胁利诱，圣文森不为所动。他坚决的态度触怒了罗马官员，他们把他绑在架子上，用铁钩拉伸他的躯体，在伤口处撒盐，然后烧红铁架，活活把圣文森烙烤得奄奄一息，又丢弃在瓦砾堆中，任由他独自死去。他的尸首被装入麻袋，抛入海中，后来被基督徒们打捞起来，得以安葬。圣文森在殉道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安宁，让看守他的人敬佩折服、悔改信主<sup>5</sup>。多纳派把圣文森作为典范，映衬出那些交出圣经的叛教者们的胆怯与失败。

多纳派名称的由来起源于一系列历史事件。米兰赦令之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生存处境大为改观，一些叛教者 (Traditors) 在逼迫缓解后步入圣职，甚至成为某些地区的主教，这种现象遭到某些在大逼迫时期坚守信仰的得胜者的坚决反对。主后 311 年，迦太基主教孟苏瑞斯 (Mensurius) 过世，接任主教职务的是当时的执事塞西里安 (Caecilian)，按立典礼由阿布萨戈主教菲利克斯 (Felix of Abthungi) 主持。菲利克斯的信仰受到当时民众的质疑，他被指控为叛教者 (Traditor)，在塞米田逼迫时期 (303-311) 把圣经交给罗马当局

<sup>3</sup> 参见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韦氏字典

<sup>4</sup> Philip Schaff,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vol. 2,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0) p.69

<sup>5</sup> Fr. Paolo O. Pirlo, SHMI, "St. Vincent", *My First Book of Saints* (Quality Catholic Publications, 1997) p. 26

焚烧。那些在大逼迫中坚守信仰的人无法接受由叛教者按立的主教，他们坚持认为，基督教圣职人员必须德行圣洁、无可指摘，唯有高品质圣职人员的祷告以及通过他们所执行的圣礼，才有属灵的果效。于是，这些反对者自行组成委员会，选出马约里努(Majorinus)成为他们的主教。马约里奴于主后 315 年过世，主教职务由多纳图斯·马格纳斯(Donatus Magnus)接任。多纳图斯受到这一异议激进群体的拥戴，任迦太基“主教”前后有四十年之久。那些反对塞西里安、拥戴多纳图斯(Donatus)的民众，就被称为“多纳派”信徒(Donatists)<sup>6</sup>。

主后四至五世纪，多纳派在北非地区形成一股分裂势力，活跃于今天的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境内，他们与主张宽容的主流教会分歧日深，对主流教会造成很大困扰。多纳派信徒起初希望借助法律途径表达他们的主张，他们向皇帝提出申诉，指控塞西里安(Caecilian)为叛教者，并质疑其担任主教圣职的合法性。为此，罗马政府和教会前后三次组织会议，召集各地主教，讨论多纳派的指控。这三次会议分别是：主后 313 年的罗马会议；主后 314 年的阿尔勒会议(Council of Arles)；以及主后 316 年的米兰会议(Council of Milan)。这三次会议都做出裁决，认为多纳派对塞西里安的指控不能成立，反倒是多纳派本身违背教会法令。会议责成多纳派必须与塞西里安主教复合，才能保持他们的圣职与尊严。尤其是 316 年的米兰决议，由君士坦丁皇帝做出的终审裁决。多纳派信徒拒绝接受这些裁决，执意诋毁主流教会、反抗政府法律，散布谣言中伤罗马皇帝。塞西里安主教多次向多纳派信徒示好，试图挽回他们，但他的善意举动反而遭到多纳派的嫉恨。主流教会多次复合努力均告失败。此后，多纳派中的激进分子逐渐诉诸暴力，袭击主流教会主教，刺杀圣职人员。主后 317 年，君士坦丁颁布谕令，严惩帝国境内扰乱秩序的极端分子，没收多纳派教会的产业。迦太基教区的多纳派信徒拒绝交出教产，当地政府派兵镇压，部分多纳派信徒被杀，圣职人员被流放。在此后的四到五个世纪里，多纳派信徒在北非地区薪火相传、绵延不息，直到八世纪时期北非地区被穆斯林征服占领，多纳派才最终销声匿迹。

### 三) 奥古斯丁对多纳派的神学思考和牧会实践

多纳派盛行的地方正是奥古斯丁担任主教的北非希坡地区。奥古斯丁参与了对多纳派的处理，留下诸多宝贵文献，对今天的教会仍然具有丰富的实践指导意义。奥古斯丁处理多纳派的总纲是爱，在前期表现为宽容和接纳，而在后期发生转变，逐渐诉诸教会惩戒，甚至借助世俗政权的力量，对多纳派施以强力胁迫。奥古斯丁在多纳派事件的处理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他的带领下，主流教会才逐渐站稳神学立场，并在人数和影响力方面逐渐胜过多纳派。

奥古斯丁对多纳派的态度，早期呈现包容与宽仁，主张用爱来感化他们。他于主后 396 年写给罗马地方官尤西比乌斯(Eusebius)的信中表达了这一观点：“上帝知道，我的心意态度都趋向和平，我并不想违背任何的意愿、强迫他们归回大公教会团契，我只是想向那些陷在错误中的人澄清这一显而易见的真理”<sup>7</sup>。在主后 400 年的一封信中，奥古斯丁如此

<sup>6</sup> 参看 Geoffrey G. Willis, *Saint Augustine and the Donatist Controversy*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Eugene, OR 1950) P. 1-25

<sup>7</sup> Augustine, *Letter* 34.1 <http://www.newadvent.org/fathers/1102.htm>

回复多纳派成员派迪里安(Petilian):“我们既不会强迫着把你们绑到我们这里,也无心杀害我们的仇敌;但我们向你们所做的,尽管有时违背你们本性的倾向,但我们所做的都是出于对你们的爱,为的是让你们自我纠错,过归正的生活…;当你们从异端中回转的时候,你们就不再是我们所憎恶的,而成为我们所爱的”<sup>8</sup>。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奥古斯丁的怀柔态度并没有感动多纳派。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间的激进势力越来越趋于极端。从奥古斯丁和多纳派人士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多纳派中的极端分子(Circumcellions)带着属灵的傲慢,把大公教会的信徒视为糠秕,把自己视为麦子,他们不单要把糠秕从麦子中分离出去,而且要除尽糠秕<sup>9</sup>。为此,这些极端分子多次采取暴力手段,残忍伏击巡回途中的主教,血腥殴打神职人员,打伤打残教会信徒,纵火焚烧教会建筑<sup>10</sup>。他们甚至在希坡城附近试图谋杀奥古斯丁本人,只是因为奥古斯丁恰好迷路才得以幸免<sup>11</sup>。多纳派信徒非但不谴责这些暴力行为,反倒支持他们,尊奉这些暴力极端分子为英雄。多纳派人士的恶劣行径,激起正统教会信徒的反感,也招致罗马政府对他们强力弹压与惩戒,政府的强力措施让很大一部分激进多纳派信徒改邪归正、回归正统教会。这些社会现象让奥古斯丁对多纳派的态度,逐渐从宽柔以教转向赞成使用外力胁迫。为此,奥古斯丁从圣经中找到三处依据,论证使用外力胁迫的合理性:1)路加福音14:23,主人吩咐仆人到外面“…勉强人进来”赴席;2)大公教会纠正多纳派,可以类比为撒拉对使女夏甲的管教与惩戒(创16:1-6;加4:21-31);3)上帝使用强力,把扫罗从马背上摔下来,促使他悔改(徒9:3-7)<sup>12</sup>。

从教义神学角度分析,奥古斯丁认为多纳派并非异端。多纳派对圣父、圣子、圣灵的信仰,与大公教会完全一致<sup>13</sup>。他们与亚流主义不同,亚流主义在圣子神性、三位一体等核心教义方面与大公信仰相左,即便他们非常愿意与大公教会合一,但终因核心信仰不同而被逐出教会。多纳派与亚流主义相反,他们在信仰内容上与大公教会相和,大公教会也尽力想与他们合一,但因着教会观、圣礼观的不同,多纳派拒绝与大公教会合一,最终沦入极端与异端的境地。奥古斯丁认定多纳派违背了以弗所书4:2-3节的教导:“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奥古斯丁认为,多纳派违背宽容精神,决意从大公教会团契中分离出去,他们因此“…坠入分裂的黑暗之中,泯灭了基督徒的仁爱之光”<sup>14</sup>。

奥古斯丁非常看重教会的合一,他坚信,“唯有在教会的合一之中,基督徒的仁爱才能得以保全”<sup>15</sup>。奥古斯丁责备多纳派:“细数使徒保罗所提到的各样美德,忍耐、仁爱、灵

<sup>8</sup> Augustine, *The Letter of Petilian, the Donatist II*, 585 <http://www.newadvent.org/fathers/14092.htm>

<sup>9</sup> Augustine, *The Correction of the Donatists* (Aeterna Press, 2014) 4.16, p.639

<sup>10</sup> Ibid, 7.27-30, p.634-644

<sup>11</sup> Augustine, *The Augustine Catechism* (New City Press, Hyde Park, New York 1999) p.47

<sup>12</sup> 这三处资料依据分别出自: Augustine, *Letter 93.5*, 380; *The City of God Against the Pag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636-638; *The Correction of the Donatists* 6.23, 642.

<sup>13</sup> Augustine, *The Correction of the Donatists* (Aeterna Press, 2014) 7.27-30, p.633

<sup>14</sup> Ibid, p.649-650

<sup>15</sup> Augustine, *Answer to the Letters of Petilian, the Donatist II* (Aeterna Press, 2014) p.588

里的合一、和平。这些都是那里所提到的圣灵的果子，但你们并不拥有圣灵。你们从教会退出的时候，你们有忍耐吗？你们离弃基督众肢体的时候，你们有爱心吗？在你们褻渎的分离中，你们哪里还有残存的合一？在你们不虔不敬的杂音中，哪里还有和平？<sup>16</sup>”多纳派信徒指责叛教者们(Traditors)是卖主卖友的犹大，但奥古斯丁针锋相对，认为多纳派中的极端分子才是犹大，因为他们“背叛了圣书上的教导”<sup>17</sup>，他们没有追随基督的榜样，基督为犹大洗脚，基督与犹大一同用餐，但这些多纳派极端分子甚至不愿意接纳愿意悔改的悖道者。他们的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基督的精神。

奥古斯丁直接回应了多纳派关于圣礼有效性的质疑。多纳派认为圣礼的有效性取决于圣职人员的节操德行，奥古斯丁则主张因功生效(*ex opere operato*)的观点。*ex opere operato* 圣礼观认为，圣礼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受礼者的资格，也不取决于执行圣礼者的资格，而完全取决于基督的救赎之功，只要受礼者预备信心，圣礼被客观执行，就应视为有效。也就是说，即便执行圣礼的主教陷溺于道德或属灵罪污之中，他所施行的圣礼依然具有属灵效力。奥古斯丁的这一圣礼观被后来的经院学派所接受，成为大公教会的主流观点。奥古斯丁对多纳派的神学回应，帮助大公教会占据理论优势，遏制了多纳分裂势力对教会的进一步侵害。也为后世教会应对类似挑战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借鉴。

#### 四) 多纳派事件对当今中国教会的借鉴意义

多纳派从坚守信仰、威武不屈、至死忠心的圣徒，沦为刚硬自义、暴虐激进、分裂教会的罪人，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的一个悲剧。多纳派事件在今日中国教会的语境中，有着特殊的历史借鉴意义。过去七十年中，中国教会和公元四世纪初期的教会非常相像，教会一直承受政府强权的逼迫与打压，世俗强权在中国教会身上切开一道道很深的伤口，硬生生把教会撕裂开来，造成了三自和家庭相互对立的局面。套用初代教会的历史模型，三自教会可以比拟为妥协屈从的体制内教会，在强权压力下主动或被迫对某些教义做出让步，以换取生存空间，他们中间有人为了自身安全或寻找进身途径，卖主卖友，成为世俗强权的打手，参与逼迫家庭教会，与当年的叛教者(Traditors)类似。而家庭教会是荆棘中的百合花，面对强权逼迫，威武不屈，忠于信仰、甘愿忍受苦难，许多牧者被判刑入狱，或被送进劳改营，他们为信仰付出巨大代价，甚至牺牲生命，就像当年多纳派所推崇的模范圣徒。历史惊人地重复着相似的逻辑，当年多纳派对叛教者的批判与拒绝，在过去七十年的中国教会历史中表现为家庭教会对三自教会的防范、排斥与拒绝。这种张力至今尚未朝着多纳派的激进方向演化，是因为中国尚未出现像君士坦丁一样宽容接纳、甚至试图利用基督信仰的世俗政权。我们几乎可以断言，一旦社会开放、信仰自由，或者基督信仰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中国教会极有可能会出现类似初代教会多纳派与妥协派之间的分歧与对立。不过，这一危机在过去几年似乎有缓解迹象。近几年政府借整改名义强拆教会十字架，所波及的很大一部分属于三自教会。三自教会经受的这些打压，在一定程度上洗刷了

---

<sup>16</sup> Ibid, p.538

<sup>17</sup> Ibid, p.534

叛教者(Traditors)的屈辱历史,也缓解了家庭和三自之间的矛盾。然而,世俗强权在教会身上留下的创伤,依然有目共睹。

今天的中国教会正面临新一轮的强权逼迫,随着宗教管理条例的颁布和实施,中国教会很有可能会重蹈覆辙,在强权的威逼利诱、分化统战的策略之下,继续分裂成为稳固派和软弱派,然后两派之间互相攻击,稳固的指责软弱的是稗子、是犹大;而软过的也可以反过来指责稳固的不肯饶恕、没有爱心、自以为义。回顾上一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历史,中国教会一直处在逼迫后的分化与撕裂之中。这种张力,既是世俗强权持续逼迫歧视的结果,也是教会经受逼迫的持续后遗症。世俗政权善于利用人性的软弱,在肢体中布散纷争,破坏教会的合一,损毁上帝的荣耀。政治的逼迫在过去深深地分裂了中国的教会,目前正在进一步分裂着教会。面对教会之殇,作为神国的工人,我们在这里展开预辩式的探讨,藉着初代教会多纳事件的创伤,希望可以帮助中国教会以史为鉴,“...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弗6:11-12)。隔着时空的距离,存着怜悯的心肠,我们看到多纳派与叛教者都是世俗强权逼迫教会的受害者。受害者之间彼此继续伤害,这会让玩权术者幸灾乐祸,也会让肢体骨肉痛彻心扉。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教会正在经历黎明前的黑暗。一旦政治环境突然宽松,我们中间曾经承受苦难、坚守信仰的人能否理性地看待政教关系,与逼迫过他们的世俗政权和平相处?而我们中间曾经软弱、否认过信仰的人,能否经过一定悔改程序,被谅解、接纳,重新回归教会团契?无论如何,让我们谨记奥古斯丁在历史深处提醒我们的圣经原则:“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弗4:2-3)。